

# 「個性主義」與「革命理想」的辯證發展 ——丁玲小說創作發展歷程及其特色

蘇敏逸\*

## 提 要

丁玲(1904-1986)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最具有時代感和時代意義的女作家。從1927年步入文壇，一直到四〇年代，丁玲完成了個人的文學發展歷程，而這文學發展歷程又與整個中國現代史及現代文學發展史密切地結合。丁玲早期的創作奠基在五四張揚個人主義和個性主義的精神上，她將女性視為完全獨立的個體，在突破封建家庭的束縛後仍不罷休，執意地追尋女性參與社會的方法。三〇年代之後，丁玲因命運的安排和自覺的選擇而走上革命道路，開始以小說創作來宣揚革命理念，實踐革命理想。抗戰爆發後，丁玲的文學生涯和革命事業進入了另一個階段，她既以大量的散文和報導文學來執行革命工作，又將她四〇年代的小說創作推向成熟階段，這些作品是她的革命經驗與文學創作最成功的結合。從丁玲一生的創作來看，「個性主義」與「革命理想」是她生命、思想中最重要的、不可偏廢的兩個部分，「個性主義」代表五四知識份子強調個人主義的系統，而「革命理想」則代表中國二〇年代中期之後蓬勃發展的政治、群眾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系統。她的作品總是呈現「個性解放」與「革命理想」此消彼長、交互更迭所組成的多重變奏，並持續地衝撞和磨合，所以她每個階段的文學創作其實都是對自我的生命問題最真誠的反省和思考。

---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關鍵詞：丁玲、現代小說、個性主義、革命理想

#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sm” and “Revolutionary Ideals” — The Journe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ng Ling’s Novel Creation**

Su Min-Y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Abstract**

Ding Ling (1904-1986) can be thought of as the female writer that was most contemporary and representative of her time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her entrance to the literary scene in 1927, Ding Ling had completed her personal literary journey by the 1940s, and this journe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ntir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s well as the entir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Ding Ling’s early creations were based upon the individualism and personalism promoted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he considered females as independent entities and insisted on pursuing means for female social participation even after breaking away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her feudal family. After the 1930s, Ding Ling star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volution due to destiny and her own will. She began advocating revolution concepts and practicing revolutionary ideals through writing novels. The outbreak of the Resistance War brought Ding Ling’s literary and revolution career into another stage. While pushing for revolution through large amount of essays and reportage literature, her novel creation reached maturity in the 1940s. These works were a successful blending of her revolution experiences and literary creation. Looking from all of Ding Ling’s creations, it is obvious that “personalism” and “revolutionary ideal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and undeniable parts of her life and thinking. “Personalism” represented the system of individualism endorsed by the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hile “Revolutionary Ideals” represented the system of political, public an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emerging after mid 1920s in China. Her works were always like a multiple variation composed of the tension and alternation between “personal liberation” and “revolutionary ideals” which collided and engaged continuously. Thus, her literary creations during each stage were in fact the most sincere introspection and reflection of her own questions of life.

**Keywords: Ding Ling, Modern Novel, Personalism, Revolutionary Ideal**

# 「個性主義」與「革命理想」的辯證發展 ——丁玲小說創作發展歷程及其特色

蘇敏逸

## 一、前言

丁玲（1904-1986）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最具有時代感和時代意義的女作家。綜觀她在 1949 年中共建國前，從二〇年代末期到四〇年代的小說創作可以發現，她總是敏銳地感受著時代的變化，感受著時代變化對她的生命帶來的衝擊和影響，因此她的作品總是走在時代的最前端，扣合著時代的關懷和思想主題。但同時她又不會因時代的潮流而迷失自己，她總是在不斷變動的歷史中清醒、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同時也企圖在變動的時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她既投入社會，又期待自己能在社會中保有自我的個性，這就使她在個人與社會、文學與政治、知識份子與群眾、情感與理智等種種問題中感受到矛盾、衝突的痛苦，又在痛苦中企圖平衡、調和這種種衝突。

正因為丁玲同時關注個人自我與集體社會革命，導致長久以來左、右兩派的評論家對她作品的評價往往是正好相反的。舉兩個鮮明的例子，丁玲一輩子的友好、在三〇年代曾擔任左聯黨團書記、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馮雪峰認為丁玲早期的小說描寫女性苦悶、徬徨的心理，正是因為這些女主人公「在主觀上是和當時的革命的社會力隔閡的」，因此她們不可能「跑到前進的社會中去，使自己得到生命的光和力」<sup>1</sup>，正因為這些時代新女性尚未投入革命陣營，因此她們對人生只會感到徬徨和寂寞。而丁玲三〇年代的〈水〉雖然因生活和鬥爭經驗不夠深廣，在創作

---

<sup>1</sup> 馮雪峰：〈從《夢珂》到《夜》——《丁玲文集》後記〉，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頁294。

上有些「公式化」的缺點，但從丁玲小說的發展來看，〈水〉代表著丁玲創作的重大突破：「她的那種向人民的嚮往，當作作家的一種前進的傾向看是正確的，她的熱情也是誠懇的。……所以〈水〉依然是作者發展上的一個標誌，同時也是我們新文藝發展上的一個小小的標誌。」<sup>2</sup>在〈水〉之後，丁玲經過艱苦的鬥爭和改造過程，在四〇年代的作品中補足了三〇年代作品的缺憾，達到藝術上的成就。而自由主義學者夏志清則以「忠於自己的作家」和「狂熱的宣傳家」<sup>3</sup>來區分丁玲早期與三〇年代以後作品的差異，他認為丁玲自 1931 年開始創作無產階級的小說後，作品就喪失了二〇年代「微帶虛無主義色彩的坦誠態度，剩下來的，只是宣傳上的濫調」<sup>4</sup>，並在此基礎上嚴厲地批評丁玲三〇年代描寫群眾的作品〈水〉和四〇年代的土改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sup>5</sup>。

平心而論，我個人認為丁玲早期接受五四「個性解放」的思想<sup>6</sup>，「個性解放」的精神和她原本就獨特、強烈而鮮明的個性是她生命的基調。後來因丈夫胡也頻遇難，又受到共產黨的照顧和社會主義革命思潮、理想的洗禮，共產黨及其所主張的政治理想和革命工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支持、幫助她度過喪夫後最痛苦難熬的一段時光，並讓她脫胎換骨，走上全新的生命道路。因此對她而言，「個性解放」與「革命理想」是她生命、思想中最重要、不可偏廢的兩個部分。「個性解放」代表五四知識份子強調個人主義的系統，而「革命理想」則代表中國二〇年代中期之後蓬勃發展的政治、群眾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系統，而這兩者在許多時候存在明顯的

2 馮雪峰：〈從《夢珂》到《夜》——《丁玲文集》後記〉，頁 297。

3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 年 11 月 15 日），頁 280。

4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頁 284。

5 夏志清對〈水〉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批評，分別見於《中國現代小說史》頁 284-288 及頁 482-488。

6 丁玲有一個開明而獨立的母親，受到母親的影響，丁玲認為自己早期思想比較複雜，但基本上對封建舊社會很不滿，可參見丁玲：〈我的中學生活的片斷〉，《丁玲文集》第五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7 月），頁 320。「五四運動」爆發後，丁玲率先剪掉辮子，參與遊行、演講活動，開始有比較強烈的愛國意識，並積極地討論婦女問題和社會問題。進入周南女中讀書後，丁玲受到國文老師陳啓明先生的教導，開始大量閱讀新文學及《新青年》上有關反封建的文章，並對法國革命故事產生共鳴。參見丁玲：〈我怎樣飛向了自由的天地〉，《丁玲全集》第五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2 月），頁 262-265。從「五四運動」到二〇年代末期開始從事小說創作，丁玲的思想基本上是圍繞在五四「反封建」與「個性解放」這一體兩面的議題上，而她的小說是更為鮮明地展現「個性解放」的精神。

歧異與衝突，這兩者之間的鬥爭，則在丁玲的心裡、作品裡劇烈地進行著，因此她的作品總是呈現「個性解放」與「革命理想」此消彼長、交互更迭所組成的多重變奏，並持續地衝撞和磨合，所以她每個階段的文學創作其實都是對自我的生命問題最真誠的反省和思考。

## 二、站在「五四」的基礎上——前衛的「個性主義」

丁玲在北京開啓她的創作生涯，她的處女作〈夢珂〉發表於 1927 年冬天，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發表於 1928 年春天，之後陸續寫成了〈暑假中〉、〈阿毛姑娘〉、〈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自殺日記〉、〈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裡〉（以上均作於 1928 年）、〈過年〉、〈歲暮〉、〈小火輪上〉、〈他走後〉、〈日〉（以上均作於 1929 年前半年）等作品。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女性，其中除了〈阿毛姑娘〉和〈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裡〉的主題比較特殊外，其他篇章都圍繞在受過五四運動洗禮的女性知識份子在人生道路上面臨的苦惱，特別集中在「愛情」和「工作」的不順遂這兩個主題上。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記〉、〈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他走後〉較偏重在戀愛的主題，而〈夢珂〉、〈暑假中〉、〈小火輪上〉則更著重在女性工作中的挫折，包括對社會現實的難以適應、理想難以實現、工作無聊，想要改變現狀，卻又害怕改變，也無力改變等問題，其餘的小說也許並不呈現具體的問題，但卻在主人公無所事事、無聊寂寞的生活和心緒中，突顯新式女性知識份子的生命困境。這些主題都是五四「個性解放」所延伸出來的議題。

〈莎菲女士的日記〉是其中出色的代表作。「莎菲」這個名字也如五四時期的「娜拉」一樣，成爲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特殊內涵和意義的代名詞。這篇小說的主題看似圍繞在莎菲的戀愛經歷上，實則丁玲想要透過莎菲呈現五四退潮之後，新式女性知識份子的人生困境和社會處境，以及她們面對愛情、欲望和人生目標時種種複雜曲折的困惑和矛盾。

爲了完整而深入地描繪「莎菲」作爲一個新式知識女性面對自己、面對朋友、面對愛情、面對人生時種種複雜矛盾的心情，丁玲選用了「日記體」的形式。這個形式提供了兩個好處，一是不需花太多心思去描寫、鋪排和組織小說重大情節事件的發展，容許「寫日記者」零零碎碎的描述拼湊出她的個性和生活。這種形式恰好遮蓋了丁玲早期小說結構鬆散的重大缺失，她的處女作〈夢珂〉，以及〈莎菲〉之後的〈暑假中〉和〈阿毛姑娘〉等作品，在「情節組織」和「敘述」兩方面都有零碎鬆散的問題，但〈莎菲〉零碎的自語式書寫反而更符合「日記體」的敘述方式。二是「日記體」可以讓「寫日記者」進行長篇的內心剖析，坦率而直接地呈現自己內心深處私密的、不願或無法對人明言的真實情感和想法（如莎菲對凌吉士肉體的渴望）。這個形式對一個專注於探索內在心理狀態的小說家來說是一大方便，丁玲聰明地選用了這個對她來說最恰當的小說形式，使她能夠自然地略去她較不擅長、也較不關心的對於主人公「外在行動」的描寫，而將整個小說篇幅聚焦於主人公心理狀態的描寫，充分並深入地開展和刻劃「莎菲」的心理狀態。因此，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主角人物沒有太多的行動，也沒有重大的情節發展，絕大部份是莎菲個人非常深刻、激烈而精采的內心衝突和自我詰問。正如藍棣之所言：「（這篇小說）高潮在於主人公的內心鬥爭，而不是人與人之間的性格衝突。」<sup>7</sup>由此可知選擇一個最恰當的小說「形式」來承載所要表現的小說「主題」，是一篇成功的小說很重要的因素。

整部小說最核心也最精彩的部份在於描寫莎菲面對「愛情」時複雜的心情<sup>8</sup>，丁玲大膽而坦白地寫出女性在面對異性和感情時非常複雜隱微又矛盾的心情。圍繞在莎菲身邊的男性有葦弟和凌吉士，葦弟對莎菲很好，但凌吉士才是真正吸引莎菲的異性。莎菲周旋在兩位男性間，精神與肉體、理智與情欲產生種種衝突和拉扯，有時期待安穩，有時又渴望刺激，使她的態度忽冷忽熱，表裡不一。例如在十月二十

<sup>7</sup> 藍棣之：〈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我在霞村的時候》〉，藍棣之：《現代文學經典：症候式分析》（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頁117。

<sup>8</sup> 藍棣之認爲〈莎菲女士的日記〉小說的核心，「是在抒訴女主角內心深處靈與肉的衝突，情欲與思想的衝突，以及最後靈怎樣戰勝肉，尊嚴怎樣戰勝欲望，真實怎樣戰勝虛假。」藍棣之：〈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我在霞村的時候》〉，頁117。

四日後半段的日記中寫到葦弟前來看她，葦弟的拜訪讓莎菲無聊苦悶的生活獲得紓解，莎菲明明是很高興的，但是她卻不願意自然地流露高興的心情，而要以冷冷地、好像不在乎的樣子來對待葦弟。她的內心希望葦弟留下來陪她，如果葦弟離開，她會恨葦弟竟然不懂得她寂寞的心，可是如果葦弟如她所願地留下來，她又覺得葦弟太順從了，太好支使了，與他談戀愛太沒有刺激感和挑戰性了。葦弟並不是莎菲真正喜歡的人，但是她還是期待葦弟能對她好，當葦弟真的對她好時，她又覺得葦弟只會愛她，而不能真正地了解她。後來出現了凌吉士，凌吉士美好的外貌使莎菲心動，在一月四日的日記中，莎菲坦率地直言她急著搬家，就是為了製造和凌吉士見面的機會。在之後的日記中可以看出，她為了吸引凌吉士的注意，欲擒故縱。在戀愛中，莎菲是用心機的，是虛榮的，也是任性的。後來她發現凌吉士並不如他的外貌那麼美好，他不但靈魂庸俗，還是個會去韓家潭玩樂的花花公子，但莎菲的情感抗拒不了凌吉士的外貌，她的理智無法說服她的情感，讓她離開凌吉士。三月二十七日晚的日記，她描寫苦苦等待凌吉士來看她時難熬的心情，生動地寫出每個戀愛中的人都會體會過的感受。最後，三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時的日記，她詳細地紀錄面對靈魂和肉體的抉擇，她的理智和情感如何激烈地搏鬥著，但她終究無法抗拒凌吉士的吸引，想要得到他的吻。然而當凌吉士真的吻了她後，她的理智又忽然清醒，她深深痛悔，痛悔自己的墮落。小說中這種種心情的描寫，都細膩地表現出女性面對感情時幽微而複雜，甚至是善變的真實心理。類似的描寫在〈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他走後〉等小說中也重複出現。

除了愛情這個主題，從日記的瑣碎記錄中還可以看到莎菲在愛情之外的人生問題，她的外在生活和內在心理都遭遇重大的困境，而外在、內在的困境又糾結在一起，互相影響。就外在生活來說，她的身體不好，有嚴重的肺病，加上她一個人離開家庭，獨自在寒冷的北方度過新年，孤獨感更加強烈。從小說來看，她現在似乎因為生病沒有讀書也沒有工作，所以她的生活非常無聊，小說開篇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記看似瑣碎，卻非常生動而細緻地呈現她無聊苦悶、無所事事的生活的基本樣態：她把牛奶反覆煨了三次，又把報紙從頭到尾詳細地看了一遍，連廣告都沒放過，甚至連今天的廣告和昨天有何差異也完全知道，都顯示她長期處在生活無聊的狀

態，時間太多，可做的事情太少，不知道如何打發時間。她的心情非常煩悶，所以看什麼都不順眼，怨氣衝天，門外有聲響時覺得其他的住客們很吵，沒有聲響時又覺得世界死寂地可怕。夥計、飯菜、窗戶、鏡子、四周的一切沒有一樣是順眼的。肺病、強烈的孤獨感加上過度空閒無所事事的生活，使得莎菲產生極嚴重的自憐心態，她覺得自己很可憐，因此希望從外在得到許多的愛和友誼來滿足她空虛的生活，她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關注她、了解她。

就內在心理來說，她的心理可以用「無法滿足」來蓋括。因為「無法滿足」，所以她總是渴望很多的愛，她總是幻想自己在病床上讀著許多親友寫來的問候病情的信，而姐妹們跪在她的床前為她祈禱，全世界的朋友都把她像公主般地捧在手心。然而現實生活不可能如此美好，所以她無法滿足，覺得身邊沒有任何朋友能「真正地」「完全地」了解她。人與人之間原本就不可能有「真正完全」的了解，而莎菲卻以這個過高的要求來對待她的朋友們。莎菲身邊並不是沒有細心關照她的朋友，毓芳、雲霖、金夏和周，以及熱愛著她的葦弟都相當愛護她，但莎菲仍不滿足，她覺得全世界只有蘊姐了解她，然而蘊姐已經過世了。假設蘊姐還在世，「永遠無法滿足」的莎菲又真的會視她為知己嗎？也是由於「無法滿足」，所以她的有許多反覆無常的行為，特別表現在愛情上，在對待葦弟和凌吉士的態度上，得不到時想征服他、掌控他、得到他，得到時又嫌棄自己所得到的竟是如此平庸的東西，悔恨自己的墮落。然而她反覆無常、無法滿足的心理狀態，也許病根正源自於她在日記中提到的一句話：「我，我能說得出我真實的需要是些什麼呢？」<sup>9</sup>因為不知道自己到底真的要什麼，所以她的心永遠無法安定，始終反覆搖擺，又像個黑洞，永遠也裝不滿。

小說具體描寫的是莎菲矛盾而病態的心理，然而未嘗不是中國新式女性知識份子面對未來的人生道路徬徨困惑的心情寫照。中國如丁玲這樣勇敢而個性鮮明的女性知識份子在經過五四與傳統家庭、包辦婚姻劇烈地鬥爭之後<sup>10</sup>，看似獲得了自由

<sup>9</sup>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丁玲全集》第三卷，頁48。

<sup>10</sup> 丁玲雖有一個開明的母親，但在父親過世後，母親帶著丁玲及弟弟回湖南常德娘家依靠舅父生活。舅父私自替丁玲訂婚，並阻撓丁玲到上海讀書，後經母親的支持解除婚約，但丁玲與舅父發生激烈

與個人主體性，得以接受教育，並且期許自己參與社會，然而前景卻未必如此光明。當丁玲從湖南長沙輾轉到南京、上海求學，又來到北京開始嘗試創作之時，她其實尚在摸索自己在社會上立足的方法，尚在找尋屬於自己真正的人生目標，未來對她而言，充滿了不確定性<sup>11</sup>。莎菲自憐自怨終至自暴自棄的精神狀態，以及出現在〈夢珂〉、〈暑假中〉、〈自殺日記〉、〈歲暮〉、〈小火輪上〉、〈日〉等篇章中無聊、寂寞、頹廢、虛無的心緒，可以說都是二〇年代猶在尋找人生目標的丁玲的心情，也是許多仍在人生道路上徬徨迷惘的中國新知識女性共同的心情，她們企圖在魯迅斷言「娜拉走後」的兩條死路中殺出一條生路<sup>12</sup>，但此時她們的前景尚且十分黯淡，需要更堅強的勇氣和更堅定的意志力。

「莎菲」系列小說突顯了丁玲在兩個方面的特殊性。在對於愛情的描寫方面，丁玲這部作品雖然寫在二〇年代末期這個革命浪潮淹沒個性解放之聲的年代，但小說的基本精神卻是五四的。「愛情」這個詞語在五四時期與在二〇年代末期以後、革命思想盛行的年代具有不同的意涵。在五四時期，「愛情」和自由、個性解放、反封建等概念結合成一組具有互文意義的詞語，丁玲早期的小說承繼五四精神，以愛情來象徵個性解放的精神，但更深刻地思考其中的問題，拿五四時期也描寫愛情的馮沅君和丁玲比較，馬上可以區分丁玲和五四前輩女作家的差異。對馮沅君來說，張揚愛情的崇高是她筆下的女主人公反叛封建觀念的策略，她和愛人是同盟戰友，馮沅君從來不描寫女主人公和愛人之間的矛盾或衝突，因為愛情是她反抗傳統所依

---

爭執，發表文章批評舅父的封建作風。參見王增如、李向東編著：《丁玲年譜長編》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頁17。並可參見丁玲的散文〈早年生活片斷〉，《丁玲全集》第十卷，頁295-301；〈我的中學生活的片斷〉，《丁玲文集》第五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頁317-328。

<sup>11</sup> 1924年夏天丁玲到北京，之後曾想過讀書或工作幾條不同的人生道路，包括投考大學、學習美術、學習法文到法國留學、做私人秘書、做家庭教師等。在苦悶中曾寫信給魯迅，渴望得到指引，後來又曾因看洪深的電影並聽了他的演講而興起當電影演員的念頭，終因無法接受電影界的現實而放棄這條路，最後終於在1927年開始寫小說。參見王增如、李向東編著：《丁玲年譜長編》上卷，頁25-38。並可參見丁玲的散文〈魯迅先生于我〉，《丁玲全集》第六卷，頁105-121。

<sup>12</sup> 魯迅曾於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發表著名的演講〈娜拉走後怎樣〉，他認為娜拉在覺醒之後，離家追求自由，但若沒有「經濟」作為後盾，她便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158-170。

待的精神堡壘<sup>13</sup>。她看似描寫愛情，實則在寫反叛傳統的故事。丁玲則在反叛傳統之後，進一步追問馮沅君逃避或無暇處理的問題，她更強調在愛情中認識性別之間種種的差異，透過愛情的苦惱更深刻地分析自己、認識自己，更徹底地追求個人獨立自主的精神。在反叛傳統的道路上，馮沅君筆下的女主人公有她的愛人作為戰友，但在愛情的過程中，丁玲認為女人只有自己，而沒有任何依靠。同時，丁玲更進一步大膽而坦率地挖掘女性內心真實的「欲望」，包括對性的欲望、對肉體的欲望（這讓人想到男性作家中的郁達夫）、想要操控種種感情的欲望、追求生命意義的欲望、對自我成就和自我定位的欲望，以及欲望像個深淵，無論如何也無法獲得滿足的失落感等問題。從這個方面來看，丁玲的個人主義是比五四女作家更為極端，也更為深刻的，她把每一個人（特別是自己）當作一個完全獨立的個人來分析，而且最關注內心精神的真實感受。她雖然透過女主人公的人際關係來呈現人物的困境，但問題本身往往不在外部，而在女主人公自身。

但是另一方面，女主人公所呈現的人生問題又具有普遍性，戀愛或工作只是她所面對的問題的表面，在戀愛和工作問題的背後，她更在意的是個人生命的目標或個人在社會中的定位。丁玲比她的前輩女作家包括冰心、廬隱、馮沅君、凌叔華等都更在意女性在社會中的位置和價值，如同五四男作家追尋自己的人生理想，丁玲也以同樣的標準來看待女性未來的道路。這樣的觀點也使她與前輩女作家區分開來。五四女作家的筆下，個人所面對的問題往往比社會問題更具體、更清晰，社會問題總是空泛地歸結為封建家庭的束縛、社會的黑暗等抽象的觀念，但丁玲不同，丁玲強調女性個人在社會的位置，她對社會問題也有更具體的認識，這在以下將討論的〈阿毛姑娘〉和〈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裡〉可以看到。而在三〇年代後，她筆下的女性個人也將更積極地進入社會。從這兩個特點可以發現，丁玲在強調個性解放、個人獨立的主體性以及社會性兩個方面，都比她的前輩女作家有更開闊更深入的發展。

「莎菲」系列小說之外，〈阿毛姑娘〉和〈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裡〉是兩篇主

<sup>13</sup>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9月15日）第一部分第三章對馮沅君小說描寫愛情的特質有很精到的分析，頁103-117。

題比較特殊的小說，它講述的是女性處境與社會現代化問題的故事。〈阿毛姑娘〉的女主人公阿毛原是一個未見過世面的山村姑娘，她離開自己貧窮荒僻的娘家嫁到西湖邊上的富裕農家後，就展開她對城市的冒險之旅。從鄰居三姐的口中，她開始想像美好的城市，她在夜晚望著西湖邊上杭州城的萬家燈火，想像那是繁星一般的鑽石寶帶。她被三姐帶領著遊逛了讓她目眩神迷的杭州城，又因富貴人家來西湖遊玩而逐漸見識到城裡人的享受，她對城市的繁華認識得越多，她的虛榮和欲望越增加，她的苦惱也越多，渴望享福的心使她對金錢產生無窮的野心。她努力勤奮地養蠶、工作，幻想自己將來能擁有富貴和幸福，但是當她領悟到光靠著他的丈夫陸小二種田是無法讓自己享受富貴生活時，她便不再工作，一心只想著作一個城市裡的摩登女人，她相信女人的命運全繫於男人身上，她開始懊悔自己的婚姻，期待到西湖來玩的有錢男人看上她。後來她想到城市裡當畫家的模特兒，遭到丈夫和婆家的處罰，灰心喪氣之餘，又知道隔壁的漂亮姑娘即使有錢也逃不過死神的安排，她開始發現她所謂的幸福全是虛幻的空想，精神上的苦悶使她鬱鬱寡歡，感到人生無味，最後走上自殺一途。〈阿毛姑娘〉描寫來自鄉村的女主人公對於城市及現代文明的啓蒙之路，但這啓蒙卻意味著墮落。〈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裡〉也表現類似的主题，小說中的阿英從鄉下到上海當妓女，她真正欣賞、喜歡的男人是在鄉下種田的、老實粗壯的陳老三，她夢見自己回到家鄉，和陳老三安安靜靜地生活。但是從夢中醒來，現實中的陳老三靠種田養不起一個老婆，更不用說來替她贖身。而阿英自己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已過慣了現在這種有錢的享樂生活，她再也不需要、也不可能回到過去了：

早上的夢，她全忘了。那於她無益。她為什麼定要嫁人呢？吃飯穿衣，她現在並不愁什麼，一切都由阿姆負擔了。說缺少一個丈夫，然而她夜夜並不虛過啊！而且這只有更能覺得有趣的……她什麼事都可以不做，除了去陪男人睡，但這事並不難，她很慣於這個了。她不會害羞，當她陪著笑臉去拉每位不認識的人時。她現在是顛倒怕過她從前曾有過，又曾渴望過的一個安分的

婦人的生活。<sup>14</sup>

〈阿毛姑娘〉等兩篇小說是〈莎菲女士的日記〉系列小說的補充，它的女主人公並不是新式女性知識份子，而是來到鄉鎮城市的農村姑娘，這兩篇小說與「莎菲」系列合觀，可以看到丁玲在二〇年代末期對當時女性艱難命運的思考，女性才剛剛擺脫封建家庭及傳統觀念的束縛，又得立刻面對現代化過程中「繁華」、「享樂」的城市生活對女性的誘惑和控制<sup>15</sup>，而這正呼應魯迅「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的結論。莎菲等新式女性知識份子努力在兩者之間殺出重圍，追求女性真正的獨立自主，但卻在現代社會中飄泊、徬徨、進退失據，找不到出路，因此對人生感到苦悶與虛無。阿毛、阿英等來自鄉村、未受過教育的純樸的女性，在無所依傍下進入城市，只有走上出賣身體賺取金錢的墮落之途<sup>16</sup>。女性處境在此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問題糾結在一起，從阿毛、阿英兩位女主人公的命運，初步展現丁玲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和思考。資本主義式的現代化文明為城市妝點了繁華和進步的炫麗外貌，卻也將女性物化得更為嚴重；女性被都市文明和享受所誘惑和吸引，為了比較快速地滿足虛榮和欲望，只有將自己成為待價而沽的商品。丁玲在處女作〈夢珂〉中即已點出問題。夢珂因難以忍受姑姑家虛偽的人們而離家出走，到圓月劇社應徵演員，然而導演在面試時要求她勒去兩鬢和額上的短髮，顯出那圓圓的額頭和兩個小小玲瓏的耳垂讓他審視。進入劇社後，所有人又當著她的面評論她的容貌，像商議生意一樣，她感到自己像妓女一樣被毫不尊重的眼光所觀覽，卻也只能任由化妝師將她的臉畫成和「四馬路的野雞」一樣。為了工作，她沒有反抗。漸漸地，她的隱忍力愈加強

<sup>14</sup> 丁玲：〈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裡〉，《丁玲全集》第三卷，頁 196。

<sup>15</sup> 這個時期對女性的物化與中國傳統模式有所不同。中國傳統將女性「私有化」，女性附屬於家庭中的男性成員，包括父親與丈夫。而在中國二、三〇年代，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伴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更為快速地進入中國，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繁華絢麗、充斥著金錢享樂的表象吸引著人們對現代化的想像和追求，女性依靠模特兒、演員、餐廳侍女等職業來謀生，看似擺脫封建傳統的束縛，卻掉入現代化社會的陷阱：女性成為被眾人「觀看」的對象，而女性之所以引起觀看的欲望，往往由於身體，而非才能與技藝。這個問題在丁玲的小說〈夢珂〉中有完整的呈現。

<sup>16</sup> 丁玲在〈阿毛姑娘〉中描述到阿毛的局限，她因為未曾受過教育，所以她不能知道城市裡有些女人是靠著自己的能力辛苦獨立地賺錢，也有的女人忍受著孤獨，在這純物質的世界裡走著寂寞的文學之路。也因此阿毛認為要得到富貴，唯有依靠男人。《丁玲全集》第三卷，頁 138。

大，能讓她忍受非常無禮的侮辱，她就這樣成為上海當紅的女明星<sup>17</sup>。正如論者所言：

夢珂的故事象徵了走入資本主義都市生活的女性的共同命運：從鄉村到都市，從反封建到求自由，非但不是一個解放過程，而是一個從封建奴役走向資本主義式性別奴役的過程，也是女性從男性所有物被一步步出賣為色情商品的過程。<sup>18</sup>

夢珂是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知識份子，離家之後為了生存，尚且無法逃脫現代社會觀看女性，將女性物化的圈套，何況是阿英等農村姑娘。在丁玲筆下，女性進入城市，未受教育的阿英直接成為妓女，受過教育的夢珂忍受著男人的眼光和評論，成為上海的女明星，不願意屈服於現代化社會的遊戲規則，就註定成為飄泊徬徨的莎菲。

丁玲此時對現代都市文明的看法與她的湖南老鄉、好友沈從文有相似之處，雖然沈從文一直以鄉下人自居，丁玲則是個前衛、時髦的城市女性知識份子，而且兩人個性迥異，往後文學之路和人生之路的發展也非常不同，甚至在兩人之間產生一輩子難以化解的齟齬和恩怨，但在這個階段，他們是創作上的同伴，而且都經歷從湖南家鄉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追求人生出路的經驗<sup>19</sup>，他們都看到了傳統純樸的中國農村和受到資本主義衝擊而快速改變的城市之間巨大的差異，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力量日漸進逼農村，破壞了農村傳統的經濟模式和農民的思維模式，也看到這股勢力所帶來的金錢、「繁華」、無窮盡的物質欲望和享受對人性的誘惑和腐化，它引發人性中的虛榮和貪欲，使許多原本純樸、知足、勤儉的鄉下人因為對物質生活

<sup>17</sup> 丁玲：〈夢珂〉，《丁玲全集》第三卷，頁 33-40。

<sup>18</sup>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第七章 丁玲：脆弱的「女神」，頁 180。

<sup>19</sup> 沈從文和丁玲從湖南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經歷並不全然相同，沈從文高小畢業後即入伍從軍，1923 年底離開湘西到北京，1924 年開始創作，1927 年 12 月因北京的出版事業相繼南遷而移居上海。參見劉洪濤、楊瑞仁編《沈從文研究資料（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年 6 月），頁 3-5。相較之下，丁玲的經歷則更為曲折，丁玲在湖南桃源、長沙讀過中學，1922 年 2 月和王劍虹到上海平民女校讀書，同年秋天退學到南京遊覽，認識共產黨員施存統和瞿秋白，被施、瞿兩人說服，於 1923 年回到上海，入上海大學讀書。1924 年 7 月到北京，之後與胡也頻相戀，並因胡也頻而認識沈從文，三個青年共同經營他們的文學之夢。1927 年底沈從文到上海後，胡、丁兩人也於 1928 年 2 月到上海。參見王增如、李向東編著：《丁玲年譜長編》上卷，頁 9-39。

產生更高的欲望而開始墮落。但在這個基礎上，沈從文和丁玲的關懷焦點並不相同，丁玲是將中國現代化的問題與她自身的女性處境結合在一起，特別突顯現代化社會對女性的物化，而沈從文則更進一步，在三〇年代發展出他個人對於「現代城市文明」與「湘西文化」兩種態度迥異的書寫系統。

丁玲對於女性處境的思考，在 1929 年出現轉折。寫作於 1929 年至 1930 年的〈野草〉、〈年前的一天〉兩篇小說<sup>20</sup>，說明丁玲逐漸擺脫「莎菲時期」的人生困境。〈野草〉中的女主人公早年也沉湎在愛情刺激的追求中，但現在她面對著南俠的追求卻毫不動心，因為她的心專注於她的小說創作中。〈年前的一日〉以丁玲自己和胡也頻的生活為藍本，描寫女主人公和她的文學同志沉浸在文學世界中，過著賣文為生，貧窮但充實、寧靜的生活。為了過年，兩人不得不預支稿費，雖然背負著沉重的欠債，但他們面對人生卻懷抱著「健全的勇猛的生活的力」，對坐著吃橘子、寫文章，將「一切生活的黑影」和「陰沉沉下著細雨的天氣」一起拋在窗外<sup>21</sup>。這兩篇小說和「莎菲」系列小說最大的差異在於女主人公擺脫了愛情的追逐和糾纏，找到自己以「寫作」為重心的生活方式，並且對自己的存在方式感到滿足和愉快，不再有〈暑假中〉、〈小火輪上〉等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在工作上的徬徨感、無力感和挫敗感。因此小說的整體氣氛和情緒一掃「莎菲」系列的頹喪和虛無，顯得和緩、舒展，甚至不乏昂揚的精神。這意味著丁玲及其筆下的「莎菲」們幾年來在社會上的衝撞和努力，此時終於有了初步的結果，她們在「墮落」和「回來」外找到「寫作」這一條「暫時」讓自己滿意的安身立命之路，即使往後的人生道路仍是艱辛而漫長。

### 三、從「個性主義」的張揚到「革命理想」的實踐

<sup>20</sup> 在《丁玲全集》中，這兩篇小說並未註明寫作時間，但根據王增如、李向東所編的《丁玲年譜長編》，〈野草〉寫作於 1929 年 5 月，〈年前的一天〉刊登於 1930 年 6 月的《小說月報》。見王增如、李向東編著：《丁玲年譜長編》上卷，頁 49、56。

<sup>21</sup> 丁玲：〈年前的一天〉，《丁玲全集》第三卷，頁 256-265。

1928年二月，丁玲和胡也頻從北京到上海，同年三月至七月曾到杭州短暫居住，之後又回到上海。在上海這個資訊發達，各種文學、社會活動蓬勃活躍的大城市，丁玲和胡也頻逐漸受到共產黨革命以及「革命文學」的影響，1929年至1930年是丁玲和胡也頻的文學活動出現轉折的年代。胡也頻在北京時期的文學態度基本上是屬於五四「為人生而藝術」一派的，他描寫社會黑暗面的悲苦，也謳歌愛情的熱烈美好。但在1928年到上海後，胡也頻開始閱讀魯迅和馮雪峰翻譯的蘇聯文藝理論，進而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及社會科學的書籍，迅速左傾，並開始提倡普羅文學。1929年發表中篇小說《到莫斯科去》，1930年發表《光明在我們的面前》等左翼革命小說<sup>22</sup>。而丁玲則在這個時期寫出了〈野草〉和〈年前的一天〉，逐漸擺脫「莎菲時期」的苦悶，於此同時，她寫出中篇小說《韋護》及短篇小說〈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這三篇作品向來被認為是「革命＋戀愛」重要的代表作。

賀桂梅在〈性／政治的轉換與張力——早期普羅小說中「革命＋戀愛」模式解析〉<sup>23</sup>中對於二〇年代末期至三〇年代初期盛行的「革命＋戀愛」小說有完整而精采的分析，她認為「革命＋戀愛」小說基本上可以蓋括地分為「蔣光慈模式」和「丁玲模式」兩種。前者是革命與戀愛的兼容，革命決定或產生了戀愛，這個系統的小說代表戀愛與革命兩種生命欲望的轉換，戀愛驅動了對革命的追求，或者革命彌補了戀愛的挫敗。後者則表現為革命與戀愛的衝突，呈現「五四時期和革命文學時期兩種現代性話語之間的衝突，同時也可以視為一種清算戀愛話語的方式」<sup>24</sup>，通過描寫戀愛極致的幸福和完滿來「揚棄」愛情，轉而追求革命。這篇論文不但突顯出丁玲「革命＋戀愛」小說的特色，也點出這類小說在丁玲小說發展歷程上的重要性。

從丁玲小說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這三篇小說代表丁玲的作品在五四個人主義

<sup>22</sup> 參見丁玲對胡也頻的回憶文章〈一個真實的一生——記胡也頻〉、〈也頻與革命〉、〈胡也頻〉，《丁玲文集》第五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頁142-178；張小紅：《左聯五烈士傳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頁69-108。

<sup>23</sup> 賀桂梅：〈性／政治的轉換與張力——早期普羅小說中「革命＋戀愛」模式解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5月，頁69-92。

<sup>24</sup> 賀桂梅：〈性／政治的轉換與張力——早期普羅小說中「革命＋戀愛」模式解析〉，頁80-81。

的精神中加入了二〇年代末期社會和文壇盛行的「革命」元素<sup>25</sup>。但「革命」元素的加入是漸進式的，在這漸進的過程中可以看到丁玲對外在世界的變化最真誠的觀察和思考。《韋護》寫於1929年冬天，取材自丁玲好友王劍虹與共產黨員瞿秋白之間的戀愛故事。主人公韋護年少時具有浪漫、感傷，對人生的一切感到空虛和懷疑的詩人氣質，後來經歷馬克思、列寧著作的洗禮，鍛鍊了意志，也堅定了信仰，回到國內從事革命工作。但是這兩重性格總是相互拉扯著，他喜歡並習慣安靜舒服、適合寫作的生活，良心卻敦促他去適應革命者的受苦耐勞，最終還是前者戰勝後者。他在忙碌的教書、翻譯生活中，仍鍾情於寫些讓他珍愛的小詩，也沉醉於不朽的文學巨著。當他開始喜歡上麗嘉時，他就感受到戀愛與革命之間的隔閡，他已經獻身給他的革命理想，不可能回到從前是個自由主義者、個人主義者，是個詩人和音樂家的年代，然而麗嘉欣賞和喜愛的，卻偏偏是後者。當韋護與麗嘉陷入熱戀之後，韋護完全荒廢了他的工作，他和麗嘉整日地窩在舒適的小屋中談情說愛，讀詩論文學，嘗到愛情的幸福與美好。愛情的美好到達極致時，同志的不滿卻加深了韋護心中的矛盾和痛苦，他感到自己不論對於愛情或信仰都是不忠實的，經過內心激烈地鬥爭後，他選擇到廣州參加革命，拋棄了麗嘉。小說講述的既是革命與戀愛之間的衝突，也是五四個人主義精神的張揚與二〇年代末期後革命所講究的政治性和集體性之間的衝突。小說最意味深長之處在於，從表面上看來，最終是革命戰勝了戀愛，堅強的理智戰勝了情感，但整部小說呈現出來最迷人的部份卻是韋護在與麗嘉戀愛時所感到精神上的滿足感和豐潤感，而為了革命理想，韋護不得不割捨讓他的靈魂感到幸福和富足的愛情。在小說中，麗嘉對韋護的工作表示理解和寬容，但韋護的

<sup>25</sup> 丁玲雖然曾在1922年至1924年間先後就讀於共產黨主持的「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學」，也認識當時重要的共產黨員李達、沈雁冰、施存統、瞿秋白等人，但當時她並未受到革命思想的吸引，而更在意尋找個人生命困境的出路，當時許多評論者都認為丁玲是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信仰者。在散文〈早年生活二三事〉、〈向警予同志留給我的影響〉、〈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前者收於《丁玲全集》第十卷，頁302-309；後二者收於《丁玲全集》第六卷，頁25-58）等文中可以看到她當時對文學的興趣遠大於政治，也不想加入共產黨，並對「某些漂浮在上層，喜歡夸夸其談的少數時髦的女共產黨員中的熟人有些意見」（語出〈向警予同志留給我的影響〉，頁28）。因此丁玲的革命意識是在二〇年代末期社會的革命氛圍中逐漸鮮明，並因胡也頻的犧牲而使她加速走上共產黨革命的道路。

同志卻對他的戀愛表達批判和不滿，似乎戀愛可以包容革命，但革命卻容不下戀愛。從小說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丁玲敏銳地感受到社會的革命氛圍，但她的基本立場和思維模式仍是五四個人主義的精神。對她而言，在文學與政治之間，她更享受〈年前的一天〉裡所描寫的追求文學的道路。

在《韋護》之後，丁玲在 1930 年六月至十月間寫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sup>26</sup>，丁玲曾說這兩篇小說是她參加「左聯」之後給讀者的獻禮，將〈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兩篇小說合觀，可以看到丁玲對「革命」與「戀愛」有更進一步、更全面的思考。〈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中的女主人公美琳原本與作家子彬過著相當舒適、享受的生活，但在子彬與革命運動者若泉對於文學的爭執和辯論中，美琳開始對幸福的家庭生活感到空虛，也逐漸對社會現狀、階級革命有所認識，最終選擇拋棄子彬，在五一勞動節走上遊行的行列。小說從子彬和美琳關係的改變說明革命和戀愛的衝突，但這衝突也在子彬和美琳的心中，子彬面對的是原有的名聲、生活、思想與進步的文藝團體之間的選擇，美琳則面對子彬的愛情與積極開展的社會運動之間的選擇。如果說子彬和美琳代表的是時代變化中尚在面對人生道路的抉擇的知識份子，更進一步的則是〈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小說中的革命者望微與女朋友瑪麗兩人各自都已確立了人生信仰。面對完全不同的人生信仰，望微努力想調解、彌平革命運動與愛情之間的衝突和隔閡，但結果卻讓他筋疲力盡；瑪麗對望微的革命工作感到呆笨和乏味，她追求愛情的完整和忠實，無法忍受望微的「分心」。最終瑪麗選擇離開望微，追求自己的幸福，望微也坦誠「信仰是永遠不會磨滅的」，小說的最後，兩人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當望微在大街上演講、示威時，他看到瑪麗衣著光鮮，歡樂地提著逛街的「戰利品」，身邊是一個漂亮的青年。

這兩篇小說中不論是子彬或美琳，望微或瑪麗，其實都正面對著五四時期與革

<sup>26</sup> 1931 年 5 月丁玲出版了自己與胡也頻的作品集《一個人的誕生》，以紀念胡也頻的犧牲。在這本作品集中，收錄了丁玲〈一九三〇年春上海〉這兩部小說。她在自序中說明〈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原本計畫寫成一個長篇，但因懷孕身體不適，故改成五個相互連貫的短篇。寫了兩篇之後，便因身體不堪負荷而中斷，接踵而來的是胡也頻遇害的噩運，以至沒有完成最初的計劃。見丁玲：〈《一個人的誕生》自序〉，《丁玲全集》第九卷，頁 8-9。

命時代兩種意識形態和思想觀念的抉擇，而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態度。子彬靠著充滿個人主義和感傷主義的作品贏得少年讀者的愛戴，他滿足於這樣的生活，不願捲入革命的聲浪中。美琳則在社會革命運動的衝擊下，無法再安於五四之後所擁有幸福的婚姻生活，而希望通過社會運動找到證明自己的方法，於是投入革命。望微有堅定的革命信仰，但他企圖找尋革命與戀愛間的和諧共處之道，終告失敗。瑪麗則厭棄望微的革命信仰，追求「戀愛至上」的人生。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篇小說都是由女主人公主動作出明快的人生抉擇，拋棄愛人，一個追隨革命，一個追求理想中的愛情，與《韋護》由男主人公作出決定、女性處於被動狀態大異其趣，這使得這兩篇小說延續丁玲之前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丁玲對自己，也是對女性人生道路的持續思考，女性在經歷五四運動的鬥爭後，擁有了自己選擇的愛情，也展開艱辛寂寞但獨立自主的文學之路，如今遇上了讓所有關心中國社會的知識份子都不能不正視的革命浪潮，女性應該怎麼選擇？是前進還是退守？雖然兩篇小說女主人公的選擇完全不同，但從內容來看，隱約可見丁玲從五四個人主義到社會革命的跨越。在〈之一〉中，丁玲從正面描寫美琳積極地進入社會，在〈之二〉中，丁玲藉由瑪麗之口說出她對愛人的不滿，但這不滿，卻意謂著愛情無法操之在我的非自主性和難以避免的缺憾：

「我使你痛苦嗎？笑話！是你在使我痛苦呢！你有什麼痛苦？白天，你去『工作』，你有許多同志！你有希望！你有目的！夜晚，你回到家來，你休息了，而且你有女人，你可以不得我的允許便同我接吻！而我呢，我什麼都沒有，成天游混，我有的是無聊！是寂寞！是失去了愛情後的悔恨！然而我忍受著，陪著你，為你的疲倦後的消遣。我沒有說一句抱怨的話。現在，哼，你倒嘆氣了，還來怨我……」<sup>27</sup>

瑪麗對望微的怒吼未嘗不是顯示：她將人生美好的希望和目的寄託在愛情上，所得到的結果只是寂寞和痛苦。瑪麗堅持繼續追尋她的愛情和幸福，但她能保證不會再次嘗到「失去了愛情後的悔恨」？丁玲寫作〈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時，正是胡也頻積極於「左聯」工作之時，丁玲在1950年的回憶文章中曾說：

<sup>27</sup> 丁玲：〈一九三〇春上海（之二）〉，《丁玲全集》第三卷，頁327-328。

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變了，他前進了，而且是飛躍的。我是贊成他的，我也在前進，卻是在爬。我大半都一人留在家裡寫我的小說《一九三〇春上海》。<sup>28</sup>

還原當時，在丁玲與胡也頻對革命的步調不一致的情況下，丁玲未嘗不會有被拋下的寂寞和痛苦，這也許刺激向來強調女性要獨立自主的丁玲對女性參與社會革命產生新的思考，她在社會革命運動中看到女性參與社會的另一條可能的出路。但這選擇並非沒有疑慮，對當時的丁玲來說，無論抉擇為何，五四個人主義精神與革命的政治性和集體性二者之間基本上是難以相容的，正如小說中的革命和戀愛是難以相容的。

真正促使丁玲走上革命運動道路的是 1931 年初胡也頻的犧牲。胡也頻遇害後，丁玲強忍傷痛，將出生未滿百日的兒子送回湖南交給母親照顧，自己仍回到上海。她在 1931 年 4 月 23 日寫作小說〈從夜晚到天亮〉，抒寫胡也頻遇難後，又與兒子分離的雙重痛苦。小說順著女主人公流動的意識，描寫一個女人在大街上錯把別的男人背影認為亡夫，欣喜之餘，猛然記起殘酷的現實，卻依然想在來往的人流中找出那張熟悉的面容。而後她不由自主地走到百貨公司的小兒服裝部，一件件孩童衣服又深深刺痛著她思念兒子的心靈<sup>29</sup>。在極度的孤獨和脆弱中，丁玲渴望找尋一條讓痛苦的心靈新生的出路：

「怎麼才能離開這舊的一切，闖進一個嶄新的世界，一個與舊的全無瓜葛的新天地。我需要做新的事，需要忙碌，需要同過去一切有牽連的事，一刀兩斷。……」<sup>30</sup>

在馮雪峰的幫助下，經共產黨中央宣傳部決議由丁玲和姚蓬子、沈起予共同擔任左聯機關刊物《北斗》的編輯，這份刊物經過幾個月的籌備、組稿，在 1931 年九月正式創刊，發行至隔年七月因被國民黨查封而停刊。除此之外，丁玲也開始參與到大學演講及左聯外圍群眾團體的組織工作，並在 1932 年三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下

<sup>28</sup> 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丁玲文集》第五卷，頁 154。

<sup>29</sup> 丁玲：〈從夜晚到天亮〉，《丁玲全集》第三卷，頁 339-347。

<sup>30</sup> 丁玲：〈回憶潘漢年同志〉，《丁玲全集》第六卷，頁 208。

半年起接替錢杏邨擔任左聯黨團書記一職，直到 1933 年五月被國民黨逮捕為止<sup>31</sup>。胡也頻的犧牲，促使丁玲走上政治、革命之路，而社會革命運動的緊張和忙碌幫助丁玲度過喪夫後那段痛苦的時光，也讓她的小說出現重大的轉變。

一般評論者都認為丁玲在 1931 年夏天寫作的〈水〉是她創作生涯中重要的轉捩點。馮雪峰在〈關於新的小說的誕生——評丁玲的《水》〉一文中認為「丁玲所走過來的這條進步的路，就是，從離社會，向『向社會』，從個人主義的虛無，向工農大眾的革命的路，好多的進步的知識份子同走過來的路」<sup>32</sup>，茅盾也在〈女作家丁玲〉中說「《水》在各方面都表示了丁玲的表現才能的更進一步的開展。……雖然只是一個短篇小說，而且在事後又多用了一些觀念的描寫，可是這篇小說的意義是很重大的。不論在丁玲個人，或文壇全體，這都表示了過去的『革命與戀愛』的公式已經被清算！」<sup>33</sup>但是在考察丁玲創作的轉變過程時，卻不能忽略早於〈水〉二、三個月寫出來的〈一天〉，這是丁玲第一篇正面描寫群眾的小說，第一篇思考知識份子與群眾關係的小說，也代表丁玲從知識份子心靈狀態的主題向「群眾」擴展的第一步。

〈一天〉中的主人公陸祥原本是個單純的大學生，因為「自覺」和「信仰」加入左翼團體，被分派負責教導、組織群眾，並撰寫工作報告。小說著重於描寫陸祥參與運動後讓他對群眾產生新的認識，以及他如何在艱困的革命工作中堅定自己的意志和信仰。這篇小說值得注意的原因有二，首先，這是丁玲對革命活動及群眾採取正面描寫的第一篇小說。許多評論者都提到丁玲「革命+戀愛」小說中的革命只

<sup>31</sup> 有關丁玲在三〇年代初期所參與的政治、革命活動，可參考丁玲散文〈我和雪峰的交往〉，《丁玲全集》第六卷，頁 267-274；〈關於左聯的片斷回憶〉、〈入黨前後的片斷回憶〉，《丁玲全集》第十卷，頁 238-244、246-250。從她當時的工作活動和心情來看，她對共產黨的活動與理想並非毫無任何質疑，然而，從人的情感狀態來說，「愛情」和「革命」在本質上具有類似的特徵，都足以激發、宣洩個人浪漫激越的情感，因此，唯有「革命」足以宣洩「愛情」失落後無以立足的狂熱激情，因此丁玲可以在喪夫後很短的時間內就全心投入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同時，這些革命工作也在兩個層面上支持著她：一是在心理層面上，從事共產黨活動既是繼續胡也頻未完成的理想，也有為胡也頻「復仇」的意味；一是在實際生活上，共產黨的忙碌工作既使她因為專注於工作，而能暫時放下喪夫離子之慟，又提供她進一步地參與社會的方法（這是二〇年代後的丁玲一直在思考、摸索的問題）。

<sup>32</sup> 何丹仁（馮雪峰）：〈關於新的小說的誕生——評丁玲的《水》〉，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頁 249。

<sup>33</sup> 茅盾：〈女作家丁玲〉，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頁 255。

是抽象的概念，而不具有實質的內容<sup>34</sup>。在胡也頻遇害前，社會革命對丁玲來說只是一條可以選擇的人生道路，至於其內涵為何，她並沒有真正的認識。1931年實際參與左聯活動後，她對革命工作有所認識，也因此讓她的社會視野從小資產階級女性知識份子的處境擴展到下層群眾。因此在這篇小說中，丁玲開始描寫知識份子與群眾的關係。第二，小說雖然開始觸及到群眾的形象，但是小說的重心仍在知識份子的心靈狀態。她描寫陸祥最初對於下層階級貧窮、吵雜、骯髒、破敗的生活環境感到難以忍受，對於窮人粗野的說話方式感到可怕，但是與他們相熟之後，他也感到他們「純真的親切」。群眾啓蒙運動常常遭遇挫折，有時辛苦經營，卻因為群眾的膽怯而前功盡棄，陸祥甚至因為深入貧民窟拜訪工人而被誤認為竊賊，面對無知、野蠻、不可理喻的群眾感到毫無溝通的可能。陸祥對這種種工作都還在適應，他不斷提醒自己「保持同這些人的平等身分」、「不能罵那些無知的可憐的婦人」、「應同情這些人，同情這種無知，應耐煩的來教導他們」，同時也不斷記起指導員石平對他的叮囑：「我們要忍耐，堅強，努力，克服自己的意識，一切浪漫的意識」，不斷鼓勵自己「在困難之中所應有的，不退縮、不幻滅的精神」。小說中知識份子和群眾的關係是隔閡的，知識份子為啓蒙者，群眾是愚頑無知的被啓蒙者。但是需要被教育的不只是群眾，知識份子也在不斷的自我教育中掃除軟弱的意志、浪漫的意識和失敗的情緒，堅定革命的信念。陸祥的心路歷程也許正是剛剛投入革命工作的丁玲的心情，她清楚地意識到知識份子和群眾的差距，有時也對群眾的無聊和無賴感到反感和惱怒，但同時也在革命工作中認識到自己性格中的弱點。

〈一天〉可以說是知識份子向群眾過渡的轉捩點，在這之後寫出的〈田家沖〉，小說描寫的重心從知識份子轉移到群眾上，這個特色最直接地表現在小說視角的轉變上，〈一天〉是從知識份子的視角出發認識群眾，〈田家沖〉則從佃農趙得勝一家人的視角去觀察一個從事秘密工作的地主三小姐如何親切和善地對待農民，融入農民的生活，並教導農民團結起來爭取自己的權益，反抗地主的剝削。農民受到三

<sup>34</sup> 參考賀桂梅：〈性／政治的轉換與張力——早期普羅小說中「革命+戀愛」模式解析〉，頁83；常彬：〈虛寫革命，實寫愛情——左聯初期丁玲對「革命加戀愛」模式的不自覺背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1月，頁178。

小姐的影響而逐漸覺醒，趙家人開始掩護三小姐的秘密工作，小說最後暗示三小姐身分暴露而被逮捕，但農民運動的火種已經在農村中散佈開來。與〈一天〉相比，〈田家沖〉中的群眾形象已有所改變，雖然群眾仍是被啓蒙的對象，但他們純樸善良而受教，很快就被三小姐的工作所感動而覺醒，而三小姐來到農村也毫無扞格之感，她幫著趙得勝家打穀、墊鞋底、照顧雞隻豬隻和菜園，幹著各式各樣的農活，和農家像一家人一樣和樂又融洽，知識份子與群眾的關係與〈一天〉完全不同。這篇小說有把革命運動過於簡單化的傾向，對於趙得勝一家的覺醒寫得太過容易，毫無矛盾、衝突或膽怯，因此小說節奏明快，色調開闊光明，完全沒有〈一天〉中的陰暗感和泥濘感，對於革命運動充滿樂觀昂揚的態度<sup>35</sup>。論者對丁玲這樣的轉變不無惋惜：

如果我們記得丁玲早期創作是如何以個人的孤獨的視點揭示環境的可笑可鄙，也許就會更進一步理解這一視點轉換中的意味，即丁玲終於完成了從女性自我到知識份子自我的撤退。女性視點撤退後，也就不會觸及唯有女性才最敏感的東西——大眾的封建意識。<sup>36</sup>

但這樣的轉變也許正是丁玲個人自覺地追求革命理想，及其政治信念逐漸建立的過程。對她來說，參與革命運動是支撐她走出喪夫之痛最強大的力量，這是「自覺」的「選擇」，她願意用革命運動的光明面，鼓舞自己在艱困的政治生活中堅持下去，用理性和意志力去壓抑她直率不受拘束的個性、感性和情緒<sup>37</sup>。這是選擇了革命理想後必要的自我教育。

在〈田家沖〉之後的〈水〉中，「群眾」成爲小說的主體，知識份子完全退出

<sup>35</sup> 丁玲自己在1933年4月的〈我的創作生活〉中曾反省〈田家沖〉的缺失，她認爲主要的缺點有二，一是「沒有把三小姐從地主的女兒轉變爲前進的女兒的步驟寫出」，二是「把農村寫的太美麗了」，因爲「我愛的農村，還是過去的比較安定的農村」。《丁玲全集》第七卷，頁14-17。

<sup>36</sup>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第七章 丁玲：脆弱的「女神」，頁192。

<sup>37</sup> 如前文所述，丁玲在〈從夜晚到天亮〉中抒寫胡也頻遇害後痛苦的心情，但在這篇小說的結尾，女主人公在喪夫之慟和對孩子強大的思念中鼓勵自己「把握著，正確的，堅忍地向前走去。不要再這末了，這完全無價值！」，但傷痛的感情卻又時時襲來，讓她感到理性是虛偽的。在這裡可以看出丁玲努力想控制和克服痛苦頹喪的精神狀態，用理性和規律的工作讓自己振作起來，理智和情感強烈鬥爭的過程，見丁玲：〈從夜晚到天亮〉，《丁玲全集》第三卷，頁345-347。

小說之外。這篇小說中的「水」包含兩個意象，一是長江氾濫，導致沿岸村莊湯家關、一渡口等處潰堤的大洪水，在這大洪水背後所隱含的是官僚和富人拿捐不修堤，導致農民家園毀壞、流離失所的階級意識。二是農民在逃難的過程中尋求鎮長、縣長的賑災，卻遲遲等不到讓人滿意的答覆，農民在忍無可忍之下決定團結起來，匯聚成比長江氾濫更兇猛的「洪水」，衝入鎮上搶回自己辛苦栽種的米糧，這個洪水背後隱含的是農民覺醒和群眾運動的力量。小說中的群眾是以一個群體的整體形象來呈現的，小說由大量的對話組成，描寫群眾在暗夜中奔相走告水患的情況、驚慌失措通知潰堤的消息、逃難之中的吵嚷和咒罵等等，但其中的個人形象並不鮮明，這樣的描寫一方面能強化在暗夜中，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無法確知潰堤消息是否正確的驚恐，同時也符合大量逃難群眾互不相識、中途作伴的情況——農民之間並不熟識，但卻共同面對導致家園毀壞的水患問題。但另一方面也顯示，丁玲此時對群眾的認識比較粗淺，她無法在大量的群眾中區別他們個別的差異，只能把他們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下層群眾的個別面目和生活景況要到 1932 年之後的〈法網〉、〈奔〉等小說中才逐漸清晰，一直到四〇年代末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完全克服這個弱點。這過程代表丁玲對下層階級的生活逐漸從「概念性」的認知深入到具體的理解。

〈水〉之後到 1933 年五月丁玲被國民黨逮捕前的一系列小說，完全可以看作是丁玲對革命的實踐<sup>38</sup>。這些小說集中在幾個議題上，首先是宣揚反帝運動，抗議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等侵略中國領土的行徑，批評日本紗廠老闆剝削勞工，以任意停工來報復群眾爭取權益的行為（〈多事之秋〉、〈夜會〉、〈奔〉）。其次是對於下層階級生活苦境的描寫，如〈法網〉中的顧美泉原本是個年輕苦幹的工人，在沉重的苦工和失業的威脅中變得暴躁易怒，又因衝動莽撞的個性而殺人。顧美泉不是小說中唯一倒楣的人，與他同住了一個吵雜擁擠狹小的樓房裡的，盡是這些窮困、失業、鬱悶而莽撞的工人，不了解社會問題根源的無知和蒙昧使他們沉淪在社會底層強作困獸之鬥，卻始終無法逃出貧窮的悲劇命運之網的束縛。又如〈奔〉

<sup>38</sup> 丁玲在〈答《開卷》記者問〉中曾提到：「這兩篇小說（〈田家沖〉和〈水〉——引者注）是在胡也頻等犧牲以後，自己有意識地要到群眾中去描寫群眾，要寫革命者，要寫工農。這以後還有一些短篇：《消息》、《夜會》、《奔》都是跟著這個線索寫的。」《丁玲文集》第五卷，頁 435-436。

中的農民因繳不出田租而坐火車逃難到上海尋求出路，卻看到上海的工人靠著打嗎啡來維持一天工作十四小時的體力和精神，仍然連糊口的錢都賺不到。受不了資本家的虐待和剝削，卻仍不能反抗，因為上海有上萬個失業的工人在等待工作機會，資本家根本沒把工人的罷工抗議放在眼裡。農村的農人想到城市尋求出路，都市的工人卻想回農村喘一口氣，小說把農村和城市底層人民的痛苦串連在一起。此外，在〈法網〉的末尾寫到顧美泉因犯罪而逃到上海，發現上海更為嚴重的失業問題後，階級意識逐漸形成，而在〈消息〉和〈夜會〉中則描寫覺醒的工人努力從事組織工作，在群眾間散佈階級意識和反帝思想，小說呈現比較昂揚的氛圍。從這些主題可以發現，從 1931 年夏天之後，丁玲專心於共產黨的社會、階級運動，這些小說可以說是她從事組織工作的成果。

1928 年到 1933 年間是丁玲個人命運的轉折點，也是她的小說主題與風格改變最大的幾年，從 1928 年丁玲第一本小說《在黑暗中》出版，到 1929 年的《韋護》和 1930 年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再到胡也頻遇難後的〈一天〉、〈田家沖〉、〈水〉以及〈水〉之後一系列描寫群眾的小說，丁玲從最鮮明的個性解放的信仰者變成一個完全放下自我，全心投入革命運動的實踐者，也從五四個性主義和個性解放的精神跨越到二〇年代末期興起的群眾運動的革命理想中。在中國現代小說家中，很少有人能像她一樣，把這兩種精神表現得如此極端。

#### 四、「個性主義」與「革命理想」的並行、衝突和磨合

1933 年是丁玲生命中又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一年的五月，丁玲被國民黨逮捕，囚居南京，直到 1936 年中與共產黨取得聯繫，並在馮雪峰等人的幫助下，在中秋節當晚從藏身的上海友人家出逃，於十月初到達西安<sup>39</sup>。在遭遇逮捕、幽囚三年

<sup>39</sup> 丁玲從囚居的南京出逃，先藏身在上海約兩週的時間，後來在聶紺弩的護送下，搭火車到達西安，再輾轉到達陝北紅軍的根據地。這段過程可參考丁玲：〈我怎樣來陝北的〉，《丁玲全集》第五卷，頁 125-131。

多的時間，丁玲被迫停筆，直到 1936 年春天才又重新開始寫作。寫於 1936 年的〈一月二十三日〉、〈松子〉、〈陳伯祥〉、〈團圓〉等小說，可能由於廢筆多時的生疏，也因為被幽囚監視的窒悶生活讓她無法毫無顧忌暢所欲言，因此這些小說的創作動機和社會意識都不像她從前（包括二〇年代的〈莎菲〉等個人主義的小說及三〇年代富有政治意涵的小說等）的小說那麼鮮明，小說結構也較為鬆散，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小說所描寫的對象，仍集中在窮苦的普羅群眾，階級意識清晰可見。

丁玲在 1936 年 11 月初到達陝北後，進入她文學事業與革命事業的另一個高峰，而她的文學事業和革命事業又常常是結合在一起的。她首先推動「中國文藝協會」的成立，擔任文協主任，抗日戰爭爆發後，擔任「西北戰地服務團」主任，於 1937 年九月底帶領服務團由延安出發，在陝西、山西等戰地前線進行慰勞和宣傳抗日的演出活動，至 1938 年七月返回延安。之後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並從事創作，1939 年底到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工作，1941 年五月起擔任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文藝欄主編，1944 年夏天回到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專職寫作<sup>40</sup>。

從戰爭前夕共產黨與國民政府的「剿匪」部隊在陝西進行激烈的武裝戰鬥，一直到戰爭期間配合抗日宣傳活動和在邊區進行各種革命鬥爭，所有的寫作都比平時更要求及時性和時效性，因此丁玲這段期間的散記、速寫和報導遠多於小說，其中較重要的包括記人的〈彭德懷速寫〉、〈憶天山〉、〈馬輝〉、〈楊伍城——我的第二個「小鬼」〉、〈風雨中憶蕭紅〉、〈田保霖——靖邊縣新城區五鄉民辦合作社主任〉等，以及紀錄工作經歷和感懷的〈到前線去〉、〈河西途中〉、〈臨汾〉、〈冀村之夜〉、〈西安雜談〉、〈秋收的一天〉、〈三日雜記〉、〈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等<sup>41</sup>。為數不多的小說則大致可以以 1939—40 年左右為界，前期小說較集中於宣揚革命事業，主題包括抗日宣傳與農民階級意識的覺醒，前者如〈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壓碎的心〉，後者如〈東村事件〉，〈新的信念〉則兼含二者。

<sup>40</sup> 丁玲這段時間的活動，可參考王增如、李向東編著：《丁玲年譜長編》上卷，頁 113-191；周良沛：《丁玲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3 年 2 月）「辯誣書」第四章，頁 349-449 以及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丁玲全集》第十卷，頁 263-283。

<sup>41</sup> 這些作品均收於《丁玲全集》第五卷。

這類小說可以說是三〇年代以後丁玲政治態度和政治活動的延續。後期的小說則在革命事業中思考個人與革命集體、群眾之間的關係，包括〈縣長家庭〉、〈入伍〉、〈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夜〉等小說。這一類的作品顯示丁玲在漫長的革命鬥爭和抗日戰爭中逐漸沉澱心緒，對現實問題有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使得她的創作生涯進入成熟的階段。

1939年九月寫作的〈縣長家庭〉以降的五篇小說，在主題上完全不同，從各個面向展現丁玲對個人與集體、知識份子與群眾、愛國情操與私人情感等等之間的矛盾有細緻而複雜的思考，由此可見她的社會認識至此已相當成熟而全面。將這些小說合觀，則可看到丁玲自身的革命理想與她個人直率鮮明的個性如何衝突和磨合。她對革命信仰的堅定態度是無庸置疑的，但她在革命集體的政策和命令中卻依然保有高度的反省能力和獨立思考的精神與勇氣。

〈縣長家庭〉中的敘述者「我」和丁玲的形象非常吻合，是擔任「西北戰地服務團」主任的丁先生。小說描寫日本軍隊攻入縣城，縣長夫婦都準備投入抗戰游擊隊，於是將八歲的女兒阿鈴託付給「我」來照顧。阿鈴是個早熟又堅強倔強的女孩，吃苦耐勞又乖巧文靜的個性深得服務團女同志們的喜愛。後來縣長想帶回女兒，阿鈴和「我」都陷入理智和情感的掙扎，阿鈴因為害怕被說成是一個不愛國的孩子而堅持不跟父親回家，甚至連見父親一面也不願意，而我的理智認為阿鈴跟著自己，前途比較光明，然而情感上又顧念她年紀尚小，不忍讓她失去雙親的呵護。小說呈現戰亂時期愛國行動與個人情感之間的掙扎，從事偉大的愛國事業必得割捨個人情感，保全個人情感則又害怕背負「不愛國」的罪名，這樣沉重的負荷，讓一個才八歲的孩子被迫壓抑、隱藏自己真實的想法和感情。小說流露出了丁玲面對個人與集體、理智與情感之間的艱難選擇，以及選擇的無奈。之所以艱難，之所以無奈，正是因為二者都是作家不願意放棄的理想。丁玲在1942年的〈風雨中憶蕭紅〉一文中描述自己在雨夜裡懷念友人，包括「一切爲了黨」「最沒有自己」的馮雪峰、過著「二重的生活」的瞿秋白和「從沒有一句話是失去了自己」的蕭紅。她在對瞿秋白的回憶中抒發過類似的心情：

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過了那麼久，卻還不能徹底地變更自己，他那種二重的生活使他在臨死時還不能免於有所申訴。我常常責怪他申訴的「多餘」，然而當我去體味他內心的戰鬥歷史時，卻也不能不感動，哪怕那在整體中，是很渺小的。<sup>42</sup>

即使早已決定為革命理想犧牲個人，心裡還是不免有所遺憾吧！即使知道是「多餘的話」，還是忍不住想說吧！這內心苦悶的「戰鬥歷史」，決不僅僅是瞿秋白的，或是丁玲的，而是當時許多願意為國家犧牲個人的知識份子共同的心路歷程。

寫於 1940 年的〈入伍〉、〈我在霞村的時候〉和〈在醫院中〉等三篇小說都涉及到知識份子（在〈我在霞村的時候〉中則著重於「個人」的意涵）與群眾（未受教育者）之間的關係，但切入的角度各有不同，小說主題也有差異。〈入伍〉透過戰時新聞記者徐清和下層士兵楊明才兩人的互相觀看來重新思考知識份子與下層民眾的差異。徐清想體驗戰爭，於是宣傳科指派因為受傷而暫時離開前線的馬伕楊明才陪同徐清到前線團部考察。出發之時徐清自信滿滿、得意洋洋，充滿了勇氣，然而一到戰爭前線，聽到鬼子就要打進村來的消息，徐清完全失去了主意，癱坐著連逃跑的力氣也喪失了，全是依靠楊明才的威嚇命令和拉扯掩護才逃出村莊。在逃難過程中，充分展現楊明才的警覺性、判斷力、求生能力和勇氣，以及忠厚可靠的善良稟氣，他感到徐清像是「害了軟骨症似的」值得同情，便「懷著一個老年人對孩子所起的那種愛惜的感情」<sup>43</sup>去照顧徐清。相反的，徐清總是用一種高傲的姿態看待楊明才，對楊明才簡單的心思感到可憐，事實上他對生活及野外求生毫無任何能力，面對未知的命運顯得怯懦而驚懼，處處依賴楊明才的救助。脫險之後兩人回到政治處，徐清驕傲地炫耀他所經歷的戰事，認為「他已經『生活』過來了，現在只需要一個安靜的環境，寫出他的經歷，那使他興奮的經歷。」<sup>44</sup>並決定回大後方寫作。面對徐清的夸夸其談，楊明才只默默地想著回隊上打仗。如果將這篇小說與丁玲 1931 年第一篇描寫知識份子與群眾關係的〈一天〉相比，特別能突顯出這篇小說

<sup>42</sup> 丁玲：〈風雨中憶蕭紅〉，《丁玲全集》第五卷，頁 135。

<sup>43</sup> 丁玲：〈入伍〉，《丁玲全集》第四卷，頁 209。

<sup>44</sup> 丁玲：〈入伍〉，《丁玲全集》第四卷，頁 212。

的特殊之處：下層民眾的形象不再是野蠻粗暴、愚昧無知，而知識份子也不再是啓蒙者的角色。相反地，知識份子得依靠下層人民的幫忙和照顧，才能在惡劣的戰鬥環境中存活下來。小說末尾用「桑科」來比喻楊明才，言下之意，徐清就是空有幻想、不務實際的「堂吉訶德」了。趙園認為〈入伍〉這類小說中知識份子和勞動者的關係顯示四〇年代「文學即以勞動者作為一種『階級力量』的明確意識，在對照中較為全面地批判知識者，改變了對照的意圖和分量。」<sup>45</sup>在此之前，丁玲一向是從知識份子的眼光和角度來觀看群眾，而正是在三〇年代形成的階級意識影響之下，丁玲開始嘗試讓知識份子和群眾處在對等的狀態下互相觀看，並呈現群眾眼光中的知識份子形象。

在〈入伍〉中，丁玲透過楊明才這個角色寫出下層士兵的務實可靠和忠厚善良，〈我在霞村的時候〉則又回到五四「反封建」的精神，從女主人公貞貞與農村群眾的對立關係，以及群眾對貞貞的流言蜚語，顯示群眾的殘忍無知和貞貞的獨立堅強。貞貞的勇敢和主見從她拒絕父親安排填房的婚事，並向夏大寶提出私奔的要求時已完全展現，後來她被日本人捉去做了軍妓，飽受磨難，但她卻沒有放棄自己生命的尊嚴，當她在偶然的機會中遇到了解放軍的游擊隊，便開始為解放軍搜集情報，為了傳送消息，甚至曾在暗夜強忍著病體的痛苦，一個人摸黑走了三十里。如今她回到故鄉養病，她依然表現獨立而鮮明的個性，她拒絕夏大寶願意娶她的好意，拒絕父母、親友、鄰人和村民哭哭啼啼的懇求、苦口婆心的勸說、不懷好意的流言或鄙夷冷漠的辱罵，她只想去延安學習、工作，追求自己的未來：

「既然已經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氣，我覺得活在不認識的人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裡，比活在有親人的地方好些。這次他們既然答應送我到延安去治病，那我就想留在那裡學習，聽說那裡是大地方，學校多；什麼人都是可以學習的。大家扯在一堆並不會怎樣好，那就還是分開，各奔各的前程。我這樣打算是為了我自己；也為了旁人，所以我並不覺得有什麼對不住人的地方，也沒有什麼高興的地方。而且我想，到了延安，還另有一番新的氣象。

<sup>45</sup> 趙園：〈知識者「對人民的態度的歷史」——由一個特殊方面看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小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年第2期，頁25-26。

我還可以再重新做一個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sup>46</sup>

貞貞憑著她堅強的意志走出一條女性艱辛的道路，但農村群眾的形象卻仍如魯迅筆下那些害死祥林嫂的村民一樣，殘忍冷酷而不自覺，完全沒有對人的同情理解之心。丁玲在這篇小說中，呈現農村封閉愚昧的狀態，也透過貞貞與村民的對抗展現強大的個性主義的精神，如同二〇年代的莎菲用生命與社會對抗。但這個性主義精神的內涵，卻不是丁玲早期小說所彰顯的「五四式」的個性鮮明的自我，而是與投入集體革命（奔赴延安）去實現自我相互結合的，如同貞貞所說的「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如果說「人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代表的是五四反封建的精神，那麼「人不一定就只是自己的」則代表丁玲對早期思想的顛覆：人不僅僅只有尋找個人生命出路這一個目標，也許還有更遠大的目標。

〈在醫院中〉與〈我在霞村的時候〉同樣描寫個人與保守、落後的封建力量之間的抗爭。但是〈在醫院中〉的陸萍與〈我在霞村的時候〉的貞貞所面對的對象卻有所不同：貞貞面對的是封閉的農村和蒙昧的群眾，陸萍所面對的則是革命隊伍中的同志。此外，〈在醫院中〉更從女主人公的經歷表現知識份子在個人與革命集體之間的擺盪與掙扎，並由此展現革命環境的複雜、革命的艱難，以及知識份子極力融入革命工作的努力和面對工作挫折時的軟弱、畏縮和搖擺。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陸萍因為黨的需要，被分配到離延安四十里地新開辦的醫院服務。儘管她曾聲辯她並不想從事醫務工作，但她無法違抗黨的命令，於是她仍然「打掃了心情，用愉快的調子去迎接該到來的生活」，並在前往醫院的途中，「有意的做出一副高興的神氣」，振奮自己的精神。在醫院工作的過程中，陸萍盡心地照顧病人，為病人改善醫病環境，對工作充滿了熱情和理想。但是醫院的一切卻讓她感到不滿，醫護人員不但毫無專業（如院長是農民出身的老革命軍人，對醫務完全外行），而且精神無聊又平庸，談話內容全是別人的八卦和閒話。此外，看護素質低落，環境骯髒零亂，醫療器具殘缺不全，使她與醫院的一切感到格格不入，只有外科醫生鄭鵬和外科助手黎涯能理解她改善醫院的理想。陸萍對醫院的不滿最後因開刀房的煤炭中毒事件而全

<sup>46</sup> 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丁玲全集》第四卷，頁 233。

面爆發，使她對革命目標產生疑惑：

她回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於革命有什麼用？革命既然是為著廣大的人類，為什麼連最親近的同志卻這樣缺少愛。她躊躇著，她問她自己，是不是我對革命有了動搖呢。<sup>47</sup>

就在陸萍決定離開醫院，並向上控告醫院的種種問題時，她遇到一個以前因為醫院誤診而被冤枉鋸掉雙腿的老革命同志，經過這個老同志的懇談和勸慰，陸萍終於更深刻地體會到革命的艱難，但也由此激勵出堅強的鬥志：

新的生活雖要開始，然而還有新的荊棘。人是要經過千錘百煉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艱苦中成長。<sup>48</sup>

〈在醫院中〉與 1942 年發表的散文〈「三八」節有感〉曾經在 1942 年的延安文藝整風時期受到批判，被認為是丁玲個人主義思想傾向的表徵。〈「三八」節有感〉與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並列受到黨內同志的思想批判，丁玲為此接受了毛澤東親自主持的高級幹部學習會的公開批判，但最後由毛澤東親自定調：「〈「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同王實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sup>49</sup>毛澤東並曾告誡她：「內部批評，一定要估計人家的長處，肯定優點，再談缺點，人家就比較容易接受了。」<sup>50</sup>丁玲因此逃過了王實味被秘密處決的劫難，但〈「三八」節有感〉也在很長的時間內被黨內同志及丁玲本人視為有嚴重缺失和爭議的作品。〈在醫院中〉也是如此<sup>51</sup>，燎熒 1942 年即在〈「人……在艱苦中生長」——評丁玲同志的《在醫院中時》〉一文中對這篇小說進行嚴厲的批判。他認為這篇小說主要的問題在於：「對於她的主人公，作者是同情的，無批判的；對於她的

<sup>47</sup> 丁玲：〈在醫院中〉，《丁玲全集》第四卷，頁 251。

<sup>48</sup> 丁玲：〈在醫院中〉，《丁玲全集》第四卷，頁 253。

<sup>49</sup> 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丁玲全集》第十卷，頁 280。

<sup>50</sup> 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丁玲全集》第十卷，頁 279。

<sup>51</sup> 張永泉在〈《在醫院中》：革命知識份子走向成熟的艱苦歷程〉一文中曾敘述〈在醫院中〉這篇小說發表後多舛的命運，張永泉：《個性主義的悲劇——解讀丁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 3 月），頁 111。

主人公周圍的人物，是責備的，否定的，同樣靜止地描寫的。」<sup>52</sup>而這缺失正彰顯作者思想上的問題：

作者在這裡也忽略了她是在描寫一個共產黨員而不是描寫普通人，是在描寫一個共產黨的事業機關中的事件而不是一般社會中的事件。在這樣一個集體中，個人的命運是不能與集體的命運分離的，個人只有和集體一同前進。對環境的進步冷淡，對這些「不行」的人（其實都是叫做「同志」的人）的進步故意漠不關心，而高談個人的進步，這樣的處理方法，是反集體主義的，是在思想上宣傳個人主義。<sup>53</sup>

類似的觀點一直延續到八〇年代初才獲得改變，嚴家炎在〈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樁舊案——重評丁玲小說《在醫院中》〉一文為這篇小說翻案，他認為「陸萍與周圍環境之間的矛盾，就其實質來說，乃是和高度的革命責任感相聯繫著的現代科學文化要求，與小生產者的蒙昧無知、偏狹保守、自私苟安等思想習氣所形成的尖銳對立。」<sup>54</sup>這篇文章首度肯定丁玲描寫出革命問題的複雜性和封建傳統問題的盤根錯節、難以清除，就此改變這篇小說的命運。

平心而論，這篇小說反映了丁玲對現實的深刻認識及其對現實問題的坦率直言：在革命的道路上荆棘遍佈，革命者的敵人不僅僅是來自外部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或國民政府的圍剿，還包括革命陣營內部的封建習氣或官僚主義，喚醒群眾加入革命行列已非易事，要改變這群未曾接受完整現代教育的群眾，並清除其充滿封建性的思想、文化和生活習慣則更為艱難。同樣艱難的還包括一個覺醒的知識份子的精神自剖和自我改造<sup>55</sup>：知識份子如何在集體命令中學習放下個人，個人遭遇革命工

<sup>52</sup> 燎熒：〈「人……在艱苦中生長」——評丁玲同志的《在醫院中時》〉，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頁 278。

<sup>53</sup> 燎熒：〈「人……在艱苦中生長」——評丁玲同志的《在醫院中時》〉，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頁 280。將〈「三八」節有感〉、〈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等作品視為表現個人主義思想的想法，在 1955 年開始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到達高峰，其論述基調可見周揚：〈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頁 412-418。

<sup>54</sup> 嚴家炎：〈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樁舊案——重評丁玲小說《在醫院中》〉，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頁 505。

<sup>55</sup> 張永泉對於這篇小說的分析就特別著重在知識份子出身的革命者走向成熟的艱苦歷程，見張永泉：〈《在醫院中》：革命知識份子走向成熟的艱苦歷程〉，《個性主義的悲劇——解讀丁玲》，頁 111-132。

作的挫折時有怎樣軟弱的、動搖的、自我懷疑的精神弱點，這些弱點又可能如何克服，而現實就是「人是在艱苦中成長」<sup>56</sup>。丁玲在表現革命現實的複雜與艱難時，依然保有對於知識份子精神狀態的高度反省，在這個意義上，〈在醫院中〉與〈「三八」節有感〉可以說是源自於同樣的思考模式。〈「三八」節有感〉同樣寫出了革命陣營內部的封建思想觀念（如男女不平等的現實、對女性種種不公平的批評和非議），也同樣寫出了女性的精神弱點以及改造精神弱點的種種方法，不同之處僅在於〈在醫院中〉的對象是革命的知識份子，而〈「三八」節有感〉的對象是女人。正因為〈「三八」節有感〉的對象是女人，又讓人不得不聯想到丁玲「莎菲時期」對女性出路的追問。然而同樣是追問，二者依然有所不同，「莎菲時期」所展現的是叛逆女性個人孤獨無望的絕叫，〈「三八」節有感〉則是給女性同志堅定而誠懇的鼓勵和告誡<sup>57</sup>。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到丁玲的成長。

〈在醫院中〉描寫知識份子出身的革命者在革命陣營裡面對工作挫折時的心理狀態，1941年寫作的〈夜〉則描寫農民出身的革命者在革命工作與日常生活難以兼顧之下的無奈和妥協。小說主人公何華明生長在最貧窮的農村，受到革命的啓蒙後加入共產黨，擔任指導員的工作。小說呈現何華明生活中多重的矛盾，而這多重矛盾又是環環相扣的。首先是革命工作和農事的難以兼顧，爲了繁重的選舉工作，何華明被迫荒廢了二十多天的農事，任土地荒蕪，甚至連著三、四天無法回家。他意識到工作的重要，但又感到泥土的氣息、強烈的陽光和一直伴著他的牛都在呼喚他。這二者的矛盾不但造成他內心的苦惱，也成爲第二重矛盾的根源——何華明和妻子的矛盾。革命工作造成夫妻之間的隔閡和差距，農事的荒廢也強化了妻子對何華明的不滿，「她罵他不掙錢，不顧家，他罵她落後，拖尾巴」；妻子大聲哭鬧咒罵，

<sup>56</sup> 小說的最後，殘廢的老革命者告誡陸萍：「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幾個人身上，否則你會被消磨下去的。在一種劇烈的自我的鬥爭環境裡，是不容易支持下去的。」這些話點出了知識份子的精神特質和可能改造的方法。丁玲：〈在醫院中〉，《丁玲全集》第四卷，頁 253。

<sup>57</sup> 丁玲在文章中提出女性的「強己」方法，其精神包括下列幾點：一、愛護自己，節制地生活，不讓自己生病。二、靠著生活的戰鬥和進取，讀書和做有意義的工作，讓自己的精神愉快。三、用腦子、有理性，才能獨立判斷。四、要有爲人類的大抱負，並且下吃苦的決心，堅持到底。這幾點從當代的眼光來看，依然是非常中肯、重要，具有前瞻性和大氣魄的。丁玲：〈「三八」節有感〉，《丁玲全集》第五卷，頁 62-63。

何華明卻「平靜地躺著，用著最大的力量壓住自己的嫌厭」。何華明與妻子外在的矛盾，又反回來痛苦自己的心。他受到革命的啓蒙後，認識了男女自由戀愛的觀念，婦聯會委員侯桂英對他表達的好感，使他因激情的誘惑更強化了對傳統家庭和妻子的不滿，這是何華明的第三重矛盾。然而在經過理智與情感的鬥爭後，身為革命幹部的理智制止了情感的衝動。當他與妻子妥協、和解、再次面對自己的革命工作時，又出現了第四重的矛盾，他在這不可推卸的工作中感到執行的艱難和自己能力的貧弱：「如何能把農村弄好呢，這裡沒有做工作的人呀。他自己是個什麼呢？他什麼也不懂，他沒有住過學，不識字，他連兒子都沒有有一個，而現在他做了鄉指導員，他明天還要報告開會意義……」<sup>58</sup>這篇小說非常細膩地描繪一個農民出身的革命者面對個人與革命工作時的種種矛盾，但這種種矛盾卻不是以尖銳的對抗性姿態來呈現，反而是以和緩而沉靜的語氣來敘述，由此展現丁玲包容這一切矛盾的胸襟：正因為現實是複雜的，革命是艱難的，革命者更應該以透徹的眼光和沉著的態度，冷靜地正視革命過程中的一切矛盾和問題。正是由於這個特點，使得這篇小說在四〇年代即獲得評論者的好評<sup>59</sup>。

抗戰爆發之後到整個四〇年代是丁玲文學創作成熟而豐收的年代，她寫作了大量的散文、報導和雜文，實踐了她的革命理想。四〇年代之後的小說，則展現丁玲作為一個革命者兼作家對於複雜的現實深刻的認識和剖析。〈縣長家庭〉呈現個人情感與愛國行動之間的矛盾；〈入伍〉透過知識份子與群眾對等的觀看同時呈現兩個不同階級眼中的「他者」；〈我在霞村的時候〉呈現個人與農民蒙昧的封建意識的對抗；〈在醫院中〉透過個人與革命陣營內部的封建意識的對抗展現革命問題的複雜性，也反省知識份子出身的革命者的精神弱點以及改造的方法；〈夜〉則描寫農民出身的革命者面對革命時的種種矛盾、困難和考驗。這些篇章幾乎涵蓋了個人、

<sup>58</sup> 丁玲：〈夜〉，《丁玲全集》第四卷，頁 260。

<sup>59</sup> 駱賓基 1944 年發表的〈大風暴中的人物——評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一文中說「〈夜〉是一篇完整的，有光潤的作品，正如一顆透明的帶著一點微瑕的玉珠。」見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頁 287。馮雪峰於 1948 年發表的〈從《夢珂》到《夜》——《丁玲文集》後記〉也認為〈夜〉「是最成功的一篇，僅僅四五千字的一個短篇，把在過渡期中的一個意識世界，完滿地表現出來了。體貼而透視，深細而簡潔，樸素而優美。」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頁 299。

集體、啓蒙、救亡、革命、知識份子、群眾、理智、情感及新舊思想觀念之間種種錯綜複雜的關係。這一系列的小說展現丁玲三〇年代之後形成的革命理想在與艱難的現實衝撞下，種種無法盡如人意，因而必須坦誠明言、勇敢面對的事實。這些小說既展現丁玲鮮明的個人特質，又展現丁玲對於革命理想在實踐過程中的種種思考。

## 五、結論

從 1927 年步入文壇，一直到四〇年代，丁玲完成了個人的文學發展歷程，而這文學發展歷程又與整個中國現代史及現代文學發展史密切地結合。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記〉聞名於文壇，整個「莎菲時期」的創作都奠基在五四張揚個人主義和個性主義的精神上。但是丁玲的個人主義比五四女作家更為前衛，她將女性視為完全獨立的個體，在突破封建家庭的束縛後仍不罷休，執意地追尋女性參與社會的方法。在一路跌跌撞撞的跋涉和探問後，丁玲找到了二〇年代末期象徵進步和前衛的「革命」。經過了二〇年代末期、三〇年代初期的《韋護》、〈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等「革命+戀愛」小說對於個人與革命理想難以兼容的思考，到三〇年代經歷胡也頻遇難的重大創傷，丁玲開始專注於革命事業，在〈一天〉、〈田家沖〉、〈水〉等小說中逐漸放下知識份子的個人情緒，進行對群眾形象的觀察和思考，並在〈水〉之後的一系列小說中以創作來宣揚革命理念，實踐革命理想。抗戰爆發後，丁玲的文學生涯和革命事業進入了另一個階段，她以「西北戰地服務團」主任的身份帶團奔赴前線慰勞戰士，又以大量的散文和報導文學宣揚抗日精神和革命的階級意識，執行革命工作。進入四〇年代，又以〈縣長家庭〉、〈入伍〉、〈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夜〉等一系列作品達到文學的成熟階段。這些文學作品是她的革命經驗與文學創作最成功的結合：實際的革命工作讓她深入農村、群眾與革命者隊伍中，讓她對現實有深刻而具體的認識，進而以她原有的文學感性表現出來。經過這些作品的磨練，丁玲才能在四〇年代末期寫出《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部作品

是丁玲最成熟的長篇小說，它既展現了丁玲對於革命工作（農村土改工作）的投入，又反應了革命內部、外部盤根錯節的利害關係和複雜面貌。從丁玲一生的創作來看，丁玲始終奮不顧身地投入社會現實和革命集體，企圖從中獲得社會的參與感，從而安頓個人的精神，卻又時時保持獨立的姿態對社會現實和革命集體的種種問題進行思索和質問。

附註：本論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文學、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多重敘述：中國三〇年代左翼文藝理論及作品研究—以胡風、馮雪峰、丁玲為中心」（NSC97-2410-H-006-080）部份研究成果，感謝兩位匿名審查教授的指導，使本論文在論證上更為周延。

## 參考書目

### 一、作家作品

丁玲，《丁玲文集》（第五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

丁玲，《丁玲全集》（全十二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二、專書

王增如、李向東編著，《丁玲年譜長編》（上、下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9月15日。

周良沛，《丁玲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3年2月。

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11月15日。

張小紅，《左聯五烈士傳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張永泉，《個性主義的悲劇——解讀丁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3月。

常彬，《中國女性文學話語流變 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

劉洪濤、楊瑞仁編，《沈從文研究資料》（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

藍棣之，《現代文學經典：症候式分析》，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

### 三、期刊論文

常彬，〈虛寫革命，實寫愛情——左聯初期丁玲對「革命加戀愛」模式的不自覺背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1月。

賀桂梅，〈性／政治的轉換與張力——早期普羅小說中「革命+戀愛」模式解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5月。

趙園，〈知識者「對人民的態度的歷史」——由一個特殊方面看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小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年第2期。